



第二部分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重视理论建设的党。近代以来的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异国欺凌，内外交困的中国成为各种理论思潮的交锋地与试验场，但只有掌握了科学理论的中国共产党，才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群众克服各种困难，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风雨历程和卓越斗争，实现了国家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国民经济恢复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上建立起来。其后，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启改革开放的新征程，都反复证明理论建设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大新修订的党章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党的十九大报告则从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的高度，对党员提出明确要求：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① 总之，理论上是否成熟，是一个政党成熟与否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并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才能克服各种困难和考验，日益成熟、发展、壮大。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3 页。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像一道曙光，驱散了近代以来笼罩在神州大地上的黑暗，艰辛探索救亡图存之路的中国先进分子终于找到了理论的基础和行动的指南。自此，中国人民奋力摆脱异国欺凌，再铸民族辉煌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马克思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自成立之时起，就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的科学的、彻底的、能真正说服人的理论。也正因如此，毛泽东才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才反复强调：“老祖宗不能丢。”

1. 《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石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理论著述中，^①《共产党宣言》是影响极为深远的一部划时代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较为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它的发表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形成和广泛传播的时代，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列宁所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②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共产党宣言》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影响最大的马列经典著作之一。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的先进分子中，有许多人正是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开始信仰马列主义，并成为中国

^① 目前，国外有关权威机构正在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全貌式地收录和呈现马克思、恩格斯所撰的各种历史文献，预计出齐为114卷。

^②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使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翻开崭新的篇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曾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①

1847年，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即正义者同盟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并改组同盟，起草指导同盟行动的政治纲领，随后，正义者同盟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在恩格斯所撰的《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了影响深远的《共产党宣言》，并于1848年2月，在伦敦公开发表，这一历史事件也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的诞生，不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理论观点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且更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时代产物，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特点。在19世纪30—40年代，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中日益暴露出的社会矛盾相伴的是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兴起，一些具有政治性质的工人组织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著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诞生标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巨著中，对当时盛行的各种唯心史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深刻批判，并全面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揭示和剖析了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物质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人类历史每一阶段的发展和性质、革命群众是革命的物质承担者等原理。此后，马克思、恩格斯就愈加摒弃黑格尔式的抽象思辨哲学，愈加关注现实的历史、社会，自觉运用这些原理对资本主义的现状和未来进行分析，《共产党宣言》就是运用这些原理而构筑的一座理论丰碑，并铺就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石。

《共产党宣言》共由两大部分内容组成：其一是最初发表时所含的一篇引言，四章正文，其二是1872年—1893年期间，马克思、恩格斯为不同版本撰写的七篇序言，即1872年德文版序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和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引言阐明了《共产党宣言》诞生的历史背景和目的、任务。第一章，即《资产者和无产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第二章，即《无产者和共产党人》，分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特点、目的和任务，以及共产党的理论和纲领。第三章，即《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假社会主义思潮，揭露了它们的阶级实质。第四章，即《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阐释了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策

^①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略。《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意义十分重大，是《共产党宣言》的有机组成部分，序言同引言和正文一起，构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完整理论大厦。《共产党宣言》问世以后，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无产阶级革命也不断面临新的形势，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共产党宣言》这一历史文献做过修改，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通过撰写各版序言来发展《共产党宣言》的科学思想，包括进一步提炼和阐明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及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并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新的经验和教训，对《共产党宣言》最初发表时一些囿于主客观条件而存在的历史局限性进行了补充、修改和完善。体现了《共产党宣言》中相关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特点。

作为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一部宣言书，《共产党宣言》内容丰富而精当，阐释系统而精辟，语言激昂而精彩，有力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① 贯穿《共产党宣言》最基本的思想，就是关于人类社会结构及社会运动规律的思想。对这一思想，1883年德文版序言曾作出提炼，强调：“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② 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又进一步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③

一是提出了“两个必然”的论断。《共产党宣言》首先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对“两个必然”进行了深入的阐发。作为一种从封建主义社会内部孕育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是一种会永恒存在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对此，《共产党宣言》指出，人类历史上的任何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具有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制度同样具有暂时的特点，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下，会经历萌芽、勃兴、成熟、灭亡的过程，这体现的就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辩证法。资产阶级作为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起到了革命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

^①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②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总之，“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的同时，《共产党宣言》辩证地指出，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无法容纳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在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作用下，资本主义制度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在此基础上，《共产党宣言》指出，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社会革命，资本主义必将完成其历史使命而灭亡，社会主义必将最终取得胜利，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必然”的论断。“两个必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分析而得出的基本结论，但必然性变成现实性还需一定的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必然灭亡不等于速朽。对此，需联系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更替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即“两个绝不会”思想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出科学而完整的结论。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①“两个绝不会”思想阐明了社会形态更替的最终动因和条件，揭示了社会发展是必然性和阶段性的辩证统一，上述两个思想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命运和社会主义未来的总体分析思路和坚实理论基础。

二是阐述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对“两个必然”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共产党宣言》进一步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存在于阶级社会之中的、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作为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会以阶级斗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发展及自身调节的作用下，并未迅速消亡而是获得了新的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陷入相对低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否能经受新的历史发展的考验，对此，邓小平的一段论述切中肯綮：“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① 江泽民也强调：“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②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后，无产阶级要通过夺取政权，迅速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和主要任务就在于利用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消灭私有制和旧的生产关系，把一切生产资料都集中在无产阶级手中，大力发展生产力，尽量扩大生产力的总量，尽可能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需要，快速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和水平。这些任务实现以后，实际上也就为消除阶级对立和阶级存在奠定了必需的物质基础。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是否会一直存在下去呢？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同样坚持历史的、辩证的立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成果，但它不会也不应该永续存在。也就是说，从历史的宽广视野看，无产阶级专政具有过渡的性质。对此，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写给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的信中有着十分精辟的分析，马克思在信中说：“（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③。把上述《共产党宣言》中和致约·魏德迈的信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结合起来分析，就可以较为完整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历史任务、历史发展趋势的总体思路，从而也就能较为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产生及它应该做什么和将会怎样发展等基本结论。

三是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建党原则。在对阶级斗争进行唯物辩证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详细阐发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的建党思想和策略原则等一系列重要观点。无产阶级作为机器大工业的产物，是

①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② 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③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具有鲜明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随着争取自身权利的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运用正确的理论武装自己，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断增强，在反抗剥削和压迫的过程中，无产阶级领导劳苦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同时，使自身获得解放，这就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使命。《共产党宣言》在这里所作的阐述，是唯物史观视野下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原则性分析，体现的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必然导致的阶级冲突和自我的消亡趋势和原因。而无产阶级只有不断提高自身阶级意识、理论水平和斗争能力，才能承担起历史所赋予的消灭不合理的旧制度，建立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新制度的使命与责任。但是，具有历史必然性并不等于历史发展的即刻性，也就是说，趋势并不等于现实，历史的发展总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由量的累积而导致的质的变化的过程。一方面由于《共产党宣言》作为战斗檄文的性质使然，另一方面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低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乐观估计了革命的形势，因此，以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总决战很快就会爆发且以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而告终，但是，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比预想更为复杂和曲折。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并没据此更改《共产党宣言》中的相关具体论述，认为应该尊重这一重要历史文献的原貌，而是在其后的各版序言和其他文献中加以完善。尤其是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承担起繁重的理论研究工作 and 无产阶级革命指导工作，对资本主义新出现的特征和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的新形势进行剖析，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继承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如 1895 年恩格斯在他生前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献，即《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客观地强调，当时欧洲的经济状况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还远未到可以消灭资本主义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最终胜利的阶段，而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更是使得“1848 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①。针对资本主义选举民主的发展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出现变化等新的情况，恩格斯结合 1866 年德国工人阶级充分利用普选权，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获选票逐年增长的典型事例，科学回答了无产阶级完成历史使命是否只能用暴力革命的方式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强调“《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有效利用普选权并将其作为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他进一步指出，德国工人争取普选权的实践的贡献就在于：“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

^①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10 页。

用普选权。”只要运用好这件武器，那么“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恩格斯强调运用普选权，但他同时也辩证地指出，运用普选这样的合法斗争形式，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暴力革命，恰恰需要深刻认识的是：“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形式不是简单划一、僵化不变的，而应该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的变迁而因势利导、丰富发展，但革命权是始终不能放弃的“历史权利”。上述这一观点综合在一起，构成了自《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完整思想。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都应该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些任务是难以完成的。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由无产阶级中最坚决、最先进的分子组成，始终站在工人运动的最前列，始终代表着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并为之矢志不渝奋斗，也就是说，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不同的利益。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成员可否来自非无产阶级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1879年的一封信件中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强调前提是其根本立场需转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对于来自非无产阶级的人要求入党，需要“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教育者……第二，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①。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人坚持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统一，这就涉及党的基本策略问题。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最近目的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自觉的阶级，夺取政权，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为实现这一最近目的，共产党人及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并不拒绝参加当时正在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是应该与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统一战线。但同时，共产党人及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必须始终坚持自身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方向，不断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水平，充分利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后的一切政治和社会条件，团结一切民主党派，大力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从而实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将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中的最近目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增加生产力总量，

^①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4—685页。



努力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从而逐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即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对立，实现共产主义。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针对当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种种诬蔑和当时盛行的各种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思潮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有力批驳，尤显重要的是，还特别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剖析，揭示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成为科学的历史必然性和根本原因；阐发了关于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最后一句话中得到了最凝练和精彩的表述，这一表述可谓脍炙人口、影响深远、令人向往，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总之，《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是深刻而丰富的，它的问世，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式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树立起了一面伟大的旗帜。《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石，自此，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篇章。《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迄今已用 200 多种文字，出版了数百种版本，影响遍及全世界，这在世界学术理论领域可谓绝无仅有。《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世界形势风云变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竞争、并存发展，历史演进体现出了必然性和曲折性交织的特点。在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在科技进步和自我调节作用下，其生产关系容纳生产力发展的能力得到拓展，从而获得长足发展。而社会主义受制度建设滞后、主观决策失误、生产力发展迟缓等诸因素影响，一度陷入低潮。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一方面貌似强大的资本主义爆发了极为迅猛、伤筋动骨的金融危机并激起了发达资本主义中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反对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彰显着巨大的感召力和光明前景，无可辩驳地体现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结论是科学的、正确的。正因《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是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邓小平才语重心长地叮嘱：“老祖宗不能丢啊。”^②当然，《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并不意味着应该僵化地固守《共产党宣言》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做出的个别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③，这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4 页。

② 邓小平：《总结经验，使用人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72 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8 页。

是学习《共产党宣言》，并用《共产党宣言》的科学原理指引实践的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2. 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十月革命是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标志着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十月革命的爆发则标志着社会主义由理论发展为实践。十月革命开辟了整个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自此，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与资本主义制度竞存并将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列宁立足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总体格局、当时俄国社会诸多矛盾尖锐对立和不断激化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实践的成果。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通过十月革命，建立起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后，列宁领导俄国人民继续围绕怎样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历史课题进行探索，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中，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在概括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新经验和 20 世纪初期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发展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体系，即列宁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被并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或马列主义，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指南。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当时在内忧外困中艰苦探索的中国先进分子以极大的启示和鼓舞，它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并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国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与俄国是有着诸多相似性的东方大国，所以，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对中国的前途与命运、革命与斗争，极富启示意义。正因如此，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从此，开始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篇章。

十月革命爆发的时代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持续三年，帝国主义各国在战争中冲突剧烈、筋疲力尽。而俄国则有数百万人失去生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缺衣少粮、城乡凋敝，地主和资产阶级却趁机大发战争财，致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1 页。



使俄国经济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甚至濒于崩溃。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俄国人民蒙受深重灾难，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广大群众已对腐朽的沙皇专制统治深恶痛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指导下，坚持不懈地在广大群众中开展宣传工作，并派出大量的干部深入各地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为提高群众的斗争意识和觉悟而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旨在推翻沙皇统治的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短短数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起义的工人和士兵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是，俄国资产阶级窃取了二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这样就出现了工兵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一个国家不可能两个政权长期并存，另一方面，临时政府调转枪口，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群众的示威游行，并准备建立军事专政，俄国革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列宁在深入分析俄国当时的国内状况和革命形势的基础上，于9月给党中央写出两份信件，即《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和起义》，指出武装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党应该迅速领导起义，夺取政权。1917年10月25日，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的工人赤卫队和士兵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以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为信号，首先举行武装起义，开始向冬宫发起攻击，深夜攻入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当晚，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举行，宣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建立苏维埃政府，无产阶级成功夺取政权。次日，列宁在大会上作报告，通过《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组成了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至1918年2—3月，在俄国全国范围内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及之后列宁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具有深远而重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十月革命的胜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会不断激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加不能容纳巨大的生产力，这个外壳最终会完成其曾经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使命，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并被突破。与此同时，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创造了受压迫、被剥削的数量庞大的无产阶级，并日益与资产阶级相对立。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意识和能力将不断提高，最终承担起建立“新世界”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和历史主体性作用相统一的基础上，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应该发生在资本主义发达

国家。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分析主要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考察对象并始终坚持上述基本观点，即使在他们晚年提出著名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探索落后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①的问题时，他们也是极为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强调：“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②恩格斯指出：“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③列宁结合时代发展的新特点和俄国当时的具体实际，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非得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爆发的论断。列宁基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出现经济政治不平衡的现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资本主义统治较为薄弱的、相对落后的国家发生并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正如列宁所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④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后来欧亚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列宁这一构想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在与实践的结合中实现了新的飞跃。正是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启迪，具有许多相似性的中国结合本国实际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

① “卡夫丁峡谷”典故出自古罗马史。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军队。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卡夫丁峡谷成为“耻辱之谷”的代名词，并可以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关于马克思所引“卡夫丁峡谷”一词的含义，理论界的主要看法包括，一是认为“卡夫丁峡谷”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过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指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整个阶段，既享有资本主义的成果又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弊端和痛苦，由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直接进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阶段。二是认为“卡夫丁峡谷”意指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前资本主义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实现生产方式的变更，同时也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新。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③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页。

④ 列宁：《论俄国革命》，《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择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充分证明，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对此，毛泽东指出，近代以来的先进分子经过艰辛的探索，面对一次次的失败，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即“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其次，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未来社会的构想变成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文献中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强调无产阶级第一步的任务是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争得民主，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然后，在掌握全部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快和尽可能大地发展生产力，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懈努力，虽然这些观点得以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有力地推进了当时的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壮大，但由于革命条件并不成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等重要观点并没有成为现实。在上述前提条件并没成立的情况下，关于未来的社会究竟具有怎样的现实特征、究竟应该怎样加以建设等一系列设想也就更谈不上付诸实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更多是一种原则性的分析和构想式的探索，许多问题还无法加以深入展开。正因如此，恩格斯才强调：“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② 也就是说，要使得某种方案具有理论和实际价值，就要有付诸实践的事实和推进实践不断发展的具体的过程，而十月革命无疑就具有这样的历史作用。通过十月革命，无产阶级政权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创立，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未来社会的构想变成了现实，并能在具体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在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未来社会的构想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列宁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既坚持真理又不拘泥于个别论断，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准确判断形势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和主观能动性，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特别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并为其他国家探索如何摆脱贫穷落后、备受欺压的命运树立了典范，鼓舞和推动了诸多落后国家，特别是当时的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解放斗争。但历史的发展总是必然性与曲折性并存，社会主义在其后的建设中既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出现了许多失误，甚至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样的重大挫折和历史教训。这些事件的发生，根本原因就是后来的苏东社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② 恩格斯：《致爱·皮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页。

会主义诸国在发展中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理论，走到了封闭僵化的死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上去，背离了自十月革命以来列宁所确立的一系列正确路线和方略。这些挫折不但不能掩盖十月革命伟大胜利的光辉，恰恰证明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十月革命以来列宁在探索中形成的一系列正确思想的重要性，正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①

再次，十月革命提升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水平并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劳资矛盾始终不断，在19世纪30—40年代发生了著名的“三大工人运动”，即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1848年，又发生了法国巴黎工人的“六月革命”；1871年更是发生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即“巴黎公社革命”。在这些工人运动或革命的过程中，由于无产阶级自身的不成熟、缺乏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加之资产阶级武装力量的无情镇压，均一一失败。历史发展至19世纪70—80年代，西方一些国家相继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政党，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以后，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更加注重运用议会斗争的手段，提出资本主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逐渐放弃甚至明确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因此，总体来看，19世纪西方的工人运动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无论其规模如何变化，实则并没有根本的、质的提升，在这样的形势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时也难见照亮前路的真正曙光。这时，十月革命的爆发及胜利打破了这样的状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意义重大的质变。在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旧政权，建立起了无产阶级自己掌握的新政权，从而成功突破了帝国主义阵营，给予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统治以沉重打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迅速掀起高潮。十月革命的胜利用鲜活的事例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十月革命胜利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相继建立起共产党，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实际结合的过

^①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程中积极探索革命和建设之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创出新的局面。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后，立即引起了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高度关注和赞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而迅速地传播。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要求人们顺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同年11月，李大钊发表了著名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称颂和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李大钊豪迈而自信地指出：“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①

最后，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宝库。无产阶级在推翻旧政权以后，立即就面临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进行详尽分析，因为他们认为不应该在这种制度还没建立起来以前，就抽象地、不切实际地设计出一套方案来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应该由以后具体开展建设的人们立足现实条件来探索。因此，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在一些经典文献中做出过原则的描述，但并未就具体的建设方略做出规划。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立即着手领导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规划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加强经济建设，重点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大工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经济基础。二是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措施是把原有的资本主义，尤其是小商品生产纳入国家资本主义^②的轨道，实行有计划的产品分配，建立由国家控制的工农业产品交换体系，引导小农采用共耕制等。在这一过程中，列宁也预见到由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必定存在大量的现实困难，因此，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积极建设大工业体系，并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中介环节逐步实现对旧阶级改造的过程中，需要谨慎而耐心地推进，不能过于迅速和激烈的实施过渡，所以，他提出告诫：“怎样实际地从旧的、习惯了的、大家都熟悉的资本主义向新的、还没有产生的、没有牢固基础的社会主义过渡，却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这一过渡搞

^①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页。

^② 当时列宁所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指由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进行监督，引导企业开展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形式。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于1953—1956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也采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国家资本主义可以说是中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现阶段，我国和外国资本家合作经营的企业也带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

得好也需要许多年。”^①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存在诸多偶然性因素，甚至突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件而打乱预期。就在1918年列宁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划还未来得及全面实施之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粉碎国内地主资产阶级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内战和外国的武装干涉。面对严峻的形势，为保卫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在列宁的领导下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采取了余粮收集制、禁止贸易、经济实物化、加速工业国有化和工业管理的集中制等等。这些举措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但因脱离当时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也带来了破坏经济发展和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许多负面作用，激起了群众甚至部分军人的不满和直接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宁决定停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极富创新意义的新经济政策。列宁所领导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依据俄国当时的实际状况，顺应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激发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激活了经济，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俄国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人民生活水平迅速得到改善，社会矛盾迅速得到缓解，有力地巩固了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政权。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列宁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提出了像俄国这样生产力落后、经济社会不发达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包括：必须结合本国实际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建立在适应和支持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积极发挥商业的作用，用商业把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小农经济结合起来；运用合作社而非强制推行的集体农庄的方式引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好商品和货币；必须利用好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又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还要有步骤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等。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认识，是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源头，其真知灼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列宁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和实践，给我国1953—1956年开展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以很大的影响；列宁所领导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及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全新认识开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先河，给我国自1978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以极大的启示，列宁的相关探索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观点、结论，至今仍极富理论魅力和实践意义。在领导建设的过程中，列宁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紧密结合本国实际搞社会主义建设，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拘泥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个别论断。列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的求实精神和开拓勇气，为每个共产党员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和划时代的重大贡

^① 列宁：《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3页。



献。十月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想到现实的巨大飞跃，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列宁关于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充实以崭新的内容。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起，并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和理论基础。

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能否正确坚持和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基础，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系统总结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探索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和总体趋势而形成的理论结晶，但是，却不能不顾各国千差万别的具体实际，生搬硬套地加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其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也强调，马列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实践充分证明，在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中，只有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才能不断由胜利走向胜利，马列主义本身也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认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正确思想指引下，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1. 建立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丰硕成果

马克思主义诞生在与当时的中国有着诸多差异性的欧洲，且主要以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分析对象，因此，如何结合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引中

国的革命实践，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而艰巨的命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与各种错误观点，尤其是与错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斗争的过程中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包含丰富内容的完整体系，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以结合中国实际的、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并形成了贯穿于上述各个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中国共产党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引，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条件。而作为被实践所证明的正确的理论和经验总结的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如党的十八大所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①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析和判断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虽然早在中共一大上就确立了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和原则，次年召开的中共二大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基本思想，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但是，在革命的具体过程中，关于革命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方法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甚至是严重的分歧。当时党内的实际情况是，长期以来，曾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国革命也不断遭遇挫折。在这样的复杂革命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在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集中党内正确意见，提出科学的分析和论断，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同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集中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领导力量、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革命的前途命运等展开调查研究，于1925年发表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于1927年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形成党关于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这两篇重要文献的发表，成为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志。大革命失败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继续推进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这时党内的许多领导人还不懂得要推进革命向前发展，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仍未摆脱欧洲和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仍将革命重心放在发动中心城市暴动和起义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土地革命实践中，结合中国有着汪洋大海般小农经济的现状，在总结“左”倾路线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通过艰辛探索，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的革命路线，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此后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继续进行深入而艰巨的理论研究，这一时期，毛泽东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撰写了大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重要理论著作，提出了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又能切实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系统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党的建设思想。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1939年底至1940年初，毛泽东相继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述，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完整理论，为抗日战争时期及以后的政权建设指明了方向。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2月20日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发表。在这篇文献中，毛泽东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深刻论证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国的灵活运用和创造性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新，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党的七大的重大历史性贡献之一就是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纲领性理论。

首先，科学判断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前途，科学分析了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要得出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前途、命运的科学结论，就必须对中国的国情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前提。大革命失败后的上世纪30年代，党内

对此曾进行过广泛争论，毛泽东结合长期调查研究所得的材料和成果，深刻论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形势，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科学结论。毛泽东认为，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得到发展，把一个封建主义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中国，但同时，在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一个独立的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下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集中表现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前一个矛盾则是最为主要的矛盾。面对这样的形势和矛盾，中国的革命只能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第一步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的任务是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国。毛泽东认为，上述两个任务只能依次展开，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形势，不正确把握两个革命任务前后相继的关系，就不能顺利推进中国革命。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某一点上来说，都是实行这第一步”^①。在这样的分析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指出区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就是革命是否由无产阶级领导。历史实践证明，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反帝反封建的胜利，而中国的无产阶级除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优点外，还具有最为集中，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下革命最坚决最富战斗力以及与广大农民有天然联系的三大鲜明特点，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能够胜任担负中国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历史重任。但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也不会自然而得，须经过激烈的斗争才能实现。一旦掌握革命领导权后，还要采取正确的策略，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给予被领导者以物质利益或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再通过政治教育，提高被领导者的政治觉悟。这样，才不至于被资产阶级扰乱阵线，才能始终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在科学判断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形势，科学分析革命领导权问题的基础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指引新民主主义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②。

其次，科学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道路等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十分明确，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667页。

^②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6页。



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其中，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最为深重，所以，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在推翻“三座大山”的过程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进而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革命。要实现革命的任务，就需要汇集最广泛的动力，新民主主义的动力是人民大众，具体而言，主要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毛泽东深刻指出，在上述革命动力中，占当时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一定要根据中国特点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广大农民中坚持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阶级的路线。这一重要论述审时度势，见解精辟，揭示了怎样看待和如何发动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马列主义的工农联盟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选择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则直接关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败。从国际共运史来看，从法国的巴黎公社到俄国的十月革命，走的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模式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有着极深的影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开展北伐战争，走的就是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权之路。大革命失败后，当时党的领导人机械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频繁领导发动城市武装起义，结果都一一失败。实践证明，这条道路不符合中国国情，是走不通的。面对这样的革命形势，毛泽东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束缚。1930年，毛泽东在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提出了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以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正确思想。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中，毛泽东又提出要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建立“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割据”。正是因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全面观察和深入思考中国的革命问题，才找到了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武装斗争之路。在贯彻、实践这条正确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找到了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工人阶级人数不占多数、社会各阶级构成复杂、反革命势力十分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对于革命的成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内部没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无议会民主等开展合法斗争的权利和

条件，而外部的帝国主义势力又十分强大，加之中国当时的反动统治十分残酷，因此，中国革命只能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在长期的武装斗争实践中，毛泽东科学总结斗争的特点和经验，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趋势，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只有把党建设好，才能运用好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大法宝。而要把成员来源多样、处于艰苦战争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好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面临许多的考验。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一系列建党思想，在这些思想指引下，党在革命考验中不断发展壮大，不断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再次，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这个纲领包含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三大方面，详细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实现的根本目标。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即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毛泽东强调，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共和国，即“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①。这个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取得革命成功后所采取的、具有过渡性质的国家形式，但也是不可逾越的国家形式。毛泽东又专门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问题。国体，指的是国家的阶级性质，也称国家制度，也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即国家的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个阶级又联合哪些阶级，对哪些阶级实行专政。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实行一定阶级的专政，不同阶级的专政形成不同的国体。政体则指政权的组织形式，也称为政治制度，也就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采取什么形式来组织政权机关。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就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进行了论述，后来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文中进行了明确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二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生产关系，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各种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社经济；三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对于不操纵国计民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2页。



生的民族资本，不但不予以没收，还要允许其发展。在上述三个方面中，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如毛泽东所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对于农民而言，首要的就是土地问题。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只有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充分调动起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农民也才能从人力和物力上有力地支持革命取得胜利。对于没收官僚资本这一举措，毛泽东认为这不仅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而且还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毛泽东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一般而言，没收资本家的财产，无疑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但近代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分为官僚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两个不同的部分，其中，官僚资本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没收官僚资本，自然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同时，被没收的官僚资本一旦集中到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政权手中，就会成为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开端，因此，没收官僚资本必然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毛泽东的这些分析体现了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到新中国建立前夕，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逐步在解放区和全国建立起来。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五种经济成分，这五种经济成分，共同构成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就是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既不是国民党鼓吹的封建专制的文化，也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里所强调的无产阶级领导，指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由无产阶级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所领导，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性质的文化，这一点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旧民主主义文化相区别的重要标志。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强调的是文化的民族形式。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所提倡的文化，应该是带有中华民族鲜明文化特征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同时，这种文化反对一切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强调的是其内容的科学性。新民主主义文化发扬五四以来的科学精神，坚持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主张以科学代替愚昧、以民主代替专制。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强调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主张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传播先进的思想

和革命的理论，从而便于群众接受、掌握和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具体化，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结合在一起，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是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中国。

纵观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四个阶段，至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历时30年，其间，有过失误和挫折，直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正确指引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面貌才日新月异，才不断由胜利走向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长期以来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改变了近百年以来中国社会的面貌和历史走向，是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取得的又一个巨大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上冲破了一个缺口，使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为世界上处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的其他国家树立了民主革命的典范。在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和总结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道路和方法、目标和未来，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2. 谋求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性贡献

在中国这样一个近代以来备受异国欺凌，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下，饱受战乱之苦的东方大国如何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此，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中国的革命分为上下篇，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经过三年恢复期的建设再到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的历史发展翻开了崭新一页，进入到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1952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根据这一思想，1953年9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这一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要通过改变生产关系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其中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总路线的主体；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总路线的两翼。1952年下半年至1956年，新中国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一过渡，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过程中，特别是在后期，虽然存在过急、过快、过粗等缺点，但总体来看，能在当时有着几亿人口且百废待兴的大国较为顺利地实现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造成生产力破坏，反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而没有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创举，为中国今后的建设、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的中国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才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开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0年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也出现了曲折和失误。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①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严重缺乏建设经验，因此在头几年，我国基本上是按照苏联模式来进行建设。对此，毛泽东在1962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就曾对此进行了客观公允的分析，认为那时由于经验缺乏，加上苏联的确也取得了经济发展上的巨大成就，所以，当时在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照搬苏联的方法，自己的创造性较少，这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而且实际上对于迅速恢复和发展我国的经济确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然而，随着苏联国内和党内出现了诸多新问题，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一些动荡，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与管理体制逐渐暴露出弊端，毛泽东陆续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我国国情。特别是当看到苏联政治上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经济上片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及轻工业的发展等问题后，毛泽东于1955年首先提出要以苏为鉴，强调应该着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1956年至1957年，中共中央投入大量的精力，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初步形成了一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最具代表性的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党所通过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通过上述成果的发表和实施，在全党基本形成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若干共识：要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基础上，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上来，把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走一条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等等。中共八大还以党的文件的形式明确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要贯彻密切联系群众，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要贯彻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等等。

1956年3月至4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召集经济部门负责人汇报工作、讨论问题，为八大召开作准备。毛泽东在认真听取相关情况并加以系统总结思考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著作，并于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① 报告论述的十大关系，均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推进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提出我国的经济建设应以重工业为中心，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要同时并举，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由于旧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于沿海，沿海工业人才较多，力量较雄厚，经验也较丰富，因此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地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要受人家欺负，就必须有一定的国防力量，但要把军政费用降到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进步；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经济建设利益放在首位，它是实现个人利益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三者的利益必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不赞成搞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提出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强调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要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犯错误并认真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关系问题上，既要重视自力更生，又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外国经验，即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着重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① 这些重要论述明确表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道路的坚定思想。为此，毛泽东从以下几方面提出了总体性的建议思路。

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又一篇重要理论著作。毛泽东在这一著作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首次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来，为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和建设提供了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唯物史观中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理论，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有没有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等问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是后来的列宁和斯大林等，均未在理论上予以全面分析和解决。对这一事关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进行了唯物辩证的深刻阐述，提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以后，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但由于这一矛盾处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因而是非对抗性矛盾，也就是说，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不需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①。在解决这一矛盾的同时，社会主义就不断得到发展，所以，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基础，在解决社会主义存在的矛盾时，要牢牢抓住生产力这个最革命、最活跃和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同时，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总题目”，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专政办法，而应该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一般公式，运用说服教育和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来解决。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有没有发展的阶段性，是否是一旦进入社会主义就会持续不断地快速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一个现实课题。马克思在1875年所著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原则性的思考，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以及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间又存在一个过渡阶段的思想，但对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中是否还有更具体的阶段性划分则未作讨论。因为马克思认为，这个问题不能做抽象的理论推演，而应该由处于未来社会中的人们自己在具体的实践中加以探索。列宁后来也萌生过社会主义分若干阶段逐步发展的思想，但未作系统展开。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首先提出了要区分社会主义“建立”和“建成”的重要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不等于社会主义就完全建成了，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始终处于运动状态，因此，在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由低到高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②1959年，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中，毛泽东又具体指出，社会主义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所需的时间更长。在接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毛泽东还提出过，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③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毛泽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214页。

^②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③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东告诫要把问题想得困难一点，把建设时间想得长一点。毛泽东的上述分析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是必然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为后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思想资源。

三是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是近百年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艰辛探索的目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要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①。据此，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在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构想，对“四个现代化”作出了更明确的表述，正式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②。并阐明要实现这一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用三个五年计划，也就是15年的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世界前列。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及分步建设的思想，基本符合中国实际且顺乎世界潮流，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为后来邓小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结合改革开放新的实践，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基础。

四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首先，在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问题上，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提出衡量政策优劣的标准，即“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③。其次，提出要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管理体制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二是在管理方式上，毛泽东认为按照行政管理方式管理企业不好，应该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进行管理，提出要充分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对于企业的内部管理和积极性发挥问题，毛泽东认为鞍钢实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做法和经验值得肯定和推广。具体来说，就是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

① 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② 周恩来：《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

③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现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毛泽东把这样的管理制度称之为值得推广的“鞍钢宪法”。三是在所有制及经济运行机制上，毛泽东提出要克服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粗造成的所有制单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问题。1956年，毛泽东对此作过生动而深刻的分析，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甚至明确提出，基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需要，“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①。

五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是毛泽东十分关注并进行了长期探索的问题。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到延安考察时，曾向毛泽东询问中国共产党如何摆脱历史上各种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57年，毛泽东又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形象的要求，指出要建设“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②。阐明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实现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辩证统一的重要性。毛泽东认为，要建设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处理好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首先是要正确处理好党群关系。一是要警惕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防止由于党的错误领导而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为避免出现这种问题，就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纪检工作，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同时，还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二是要正确处理好党的正确领导与群众的矛盾问题。毛泽东对此有十分深刻的分析，指出，有些群众容易出现较为重视当前利益、局部利益、个人利益的情况，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因此而忽视或不了解长远利益、集体利益、全局利益，就会与党的正确领导产生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需要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兼顾三者的利益，并在群众中经常性地开展生动活泼、切实有效的政治教育和政策解释工作，既说明真实情况又与群众一道，认真研究解决困难的办法。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辩证而深刻的，

^① 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对于当前我国正确处理社会利益多样化条件下的矛盾问题，具有价值论和方法论层面的现实指导意义。

六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问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问题高度重视，并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构想，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两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建设思想。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上，毛泽东提出要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明确强调，在艺术问题上要百花齐放，在学术问题上要百家争鸣。毛泽东形象地说，不能简单地拿一种学术压倒另一种学术，这种学术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你讲的只要是真理，就不怕拿出来检验，只要是真理，信的人势必会越来越多。1957年，毛泽东对“双百”方针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提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一论述说明了正确的东西必须在同错误的东西相互竞争比较中才能发展，因此对待文化问题，尤其是对待不同观点、不同风格的作品，不能用帽子压人，不能用棍子打人，不应该简单禁止，而应该让他们百花齐放，互相竞争，凸显真理，并在此过程中教育和引导人民，也就是说，“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①。除分析如何正确对待国内的不同文化和学术观点而外，毛泽东还提出要处理好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与借鉴吸收国外长处的问题，认为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世界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好的东西都要学。但这样的学习不是照搬照抄，全盘吸收，而是有所区别，有所批判，把其中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并与自己的东西相结合，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毛泽东的这些见解充分彰显了辩证性和科学性，也是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毛泽东在艰辛的探索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但是，历史的演进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充满考验和曲折。在探索的过程中，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以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去试图改变生产关系的错误，也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②。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页。

这些失误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在确定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时，没有始终处理好经济建设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尤其是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过分重视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而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上存在不足。在领导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又存在忽视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规律，脱离实际，急躁冒进，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求快求“纯”的问题，而对已经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坚持不够或出现“左”的错误等等。但总体来看，这些失误和挫折是在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在此过程中积淀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是值得汲取的宝贵思想财富。1978年改革开放新篇章的展开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总结，离不开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正确思想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凝结着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探索的智慧和心血。这一理论体系由邓小平理论奠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科学发展观拓展，深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坚定不移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1. 邓小平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奠基性解读

在中国这样一个近代以来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小农经济占很大比重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必然是一项十分艰巨且必定会面临诸



多考验甚至挫折的艰巨历史任务。出现挫折不可怕，关键是如何正确看待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具体实践，既继承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立足本国实践谱写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首先在思想理论上领导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针对当时存在的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的弊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领导和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并深刻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①在花大力气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同时，邓小平一方面领导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揭开了以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序幕。另一方面，邓小平领导全党正确看待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和晚年错误，提出“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②。在这样的基础上，邓小平开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艰辛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邓小平认为，长期以来，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这是实践中出现各种错误和挫折的认识论根源。从国内来看，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也出现了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甚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挫折和严重错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出来。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旦出现新考验和新挑战，往往也易产生诸如姓“社”还是姓“资”的无谓争论。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苏联既取得过巨大成就，也日益暴露出体制僵化等弊端，一直追随苏联模式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先后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二战以后，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其中一些国家也想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走上振兴之路，但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实现目标，反而经济出现各种困难，以致越搞越穷。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判断不准，认识不清有直接的关系。对

^①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②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此，邓小平总结认为，总起来看，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只我国有，苏联也在研究这个问题。邓小平认为，苏联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在全面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始终围绕这个根本问题进行思考，多次强调认真思考和科学回答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出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不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要解放思想。他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① 特别是改革开放实行了一段时间后，邓小平总结新鲜经验，比较系统地阐述和科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② 这一论述把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为诸多经验教训中最重要的一条，阐明了只有科学回答这个问题才能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才能立足本国实际建设好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也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作出了奠基性、开拓性贡献。围绕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方面，初步作出了深入分析和科学回答。而邓小平理论经历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的产生阶段、十二大到十三大的形成阶段、十三大到十五大的继续发展和完善阶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个体系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即邓小平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后来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正如党的十八大所指出：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③

① 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② 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③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一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抓准了，才能避免认识上的误区和实践上的偏差。1980年5月，邓小平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新概念，标志着邓小平已经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形成了最关键的理论突破与创新。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并特别强调：“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①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邓小平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1990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又提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②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综合过去形成的认识成果，完整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这一内涵丰富的重要论述是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长期思索而得的理论结晶，成为邓小平理论中光彩夺目的一颗明珠。这一重要论述包含两个有机统一的方面：一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二是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变革生产关系，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既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那么，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然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要达到共同富裕，那么，就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来衡量工作成效。而要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就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的动力。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动力就是改革，并把改革认为是一场新的革命。他明确指出：“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④他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

① 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② 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③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④ 邓小平：《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①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实际上所坚持的就是始终把生产力看成社会变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引导人们更加自觉主动地通过改革不断克服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使社会主义制度始终保持自我调节、不断完善、健康发展的状态。在实行改革开放，努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邓小平极为重要的一个理论创新就是正确看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极为重要的一个实践创举就是着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邓小平提出计划与市场都只是手段，而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范畴。市场与计划是辩证的统一，市场之中有计划，计划之中有市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存在矛盾，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应该运用。邓小平认为，不只是市场，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东西，都应该广泛借鉴、大力吸收，他指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因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通过这些重要论述，实际上就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做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道路问题。“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②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邓小平强调要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而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就在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作为人类历史上艰巨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样必须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才能兴利除弊，克服困难，取得胜利。从国内来看，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既取得了迅速恢复生产力发展、迅速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就，但也发生了严重脱离国情、超越实际发展阶段，甚至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失误。从国外来看，苏联模式日益暴露出诸多弊端，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革，搞所谓的新思维，在改革中没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上了改旗易帜的邪路，放弃了社会主义，导致了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葬送了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他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围

^①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于意识形态的桎梏，或者在传统的老路上故步自封，没有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没有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苏东剧变发人深省，而于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启示就是一定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透彻的总结，首次明确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 这一重要论述内涵十分丰富，最为突出的有二：一是要用历史的眼光和实践的方法看待道路的选择问题。选择怎样的道路，不能空对空地进行理论分析，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总结学习借鉴外国经验之利与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之弊。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能走出自己的道路。也就是说，能不能自觉地把两者结合起来以及把两者结合得怎么样，这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的根本所在。实践充分证明，只有道路找准了才能明确方向，才能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正是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不断地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绩。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才强调指出：“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②

三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划分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要建设好社会主义，就必须对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作出科学的判断和分析，否则，就可能出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超越阶段的失误和挫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深刻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具有长期性，这一点和我国的国情密不可分。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③ 邓小平进而明确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界定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提出一切都要从社会主

^①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③ 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义初级阶段的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制定政策，推进发展，既不降低标准搞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又不超越阶段搞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所以对于这项无先例可循，无模式照搬的艰巨事业，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只能不断地去探索、实践、总结。这些论断的提出，进一步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认识和把握。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十三大报告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① 报告明确表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② 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分析和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指出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一点上，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长期坚持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离开了这一点，不但不能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且也不可能建设好社会主义。邓小平同时指出，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要长期经历的阶段就松劲懈怠，“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③。这些论断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的深刻性与辩证性。既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那么就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分步进行。对此，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按照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获得快速发展，到2000年已经如期完成了前两步发展目标。到20世纪末，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0810亿美元，人均854美元（即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人均800美元的指标）。如果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980年的6倍以上，也就是说，超过了原定20年翻两番的目标要求。

^①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②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6页。

^③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



邓小平理论内涵丰富，视野宽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还系统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一国两制的祖国统一构想、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硬、民主法制建设、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加强党的建设等一系列真知灼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2.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创造性回答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继邓小平理论之后的又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结合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行了创造性回答。无论是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抑或是对于探索党的执政规律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都充分彰显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任何理论的萌芽、发展和完善，都离不开一定的时代背景，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产生。“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也是在回应时代课题的过程中，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

从世情来看，国际局势发生着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原有的两极对峙格局结束，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格局全球化趋势持续发展，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依然存在，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国际竞争更趋激烈，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更加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信息网络的普及应用，引起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既给世界各国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也提出了严峻挑战。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区域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挑战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从国情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特

^①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页。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增强，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同时，我国的整个社会出现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变化，无论是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就业方式还是人们的价值追求、生活习惯、行为特点等，都体现出复杂多变的现实特点，而这种复杂化和多样性还呈现出愈加深化的趋势。特别是随着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不同阶层间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另外，我国还存在生产力发展不均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增大以及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约束性凸显等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党情来看，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艰苦奋斗，无论是党员队伍还是党所处的地位和历史方位，或是党所肩负的任务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概括地说，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将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地位和担负的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国家建设的党，党面临的外部环境和执政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党，成为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党的力量在增强的同时，也增加了自身建设和管理的难度；从一个党员年龄、经历构成都比较单一的党，成为党员和干部队伍都经历了不断的新老交替的党。与这些变化相伴的是，一些党员在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出现了思想僵化、信念动摇、纪律松弛甚至贪污腐化等严重问题。与此同时，苏联、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更是值得深刻反思。因此，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建设，是必须始终高度重视的一个课题。

基于对世情、国情、党情做出全面的发展的和科学的判断，江泽民深刻总结了一些无产阶级政党由长期执政到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和一些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正确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验；深入思考了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对党的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刻地阐明了党在新时期加强自身建设、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的根本要求。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首次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全面阐述，明确提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



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人类又来到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①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对“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进行了阐释，对如何践行“三个代表”作出了具体的要求，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②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其中，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基础，是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前提，发展先进文化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思想保证，发展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而人民群众是创造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主体力量，又是实现其自身根本利益的重要力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包含的各个方面之间的有机关系，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和辩证思维的方法。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探索和总结的过程中，江泽民十分明确地阐明了坚持“三个代表”所要实现的党建目标，就是“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执政党应当树立怎样的执政理念以及执政党

^① 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②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276、279页。

应该如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基础问题。所谓执政理念，就是一种执政意识，是执政党的精神支柱，是执政党的理想、信仰、信念和价值观的集中表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本身就集中体现了党执政的最高价值取向。同时，围绕这个核心理念形成了一个理念体系，如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理念；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的理念；用改革精神推进党的建设的理念；坚持“两个务必”，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理念；建设学习型政党的理念等等。特别是强调全党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的理念，使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坚定的执政意识，清醒的风险意识，而且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从而为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价值导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诠释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道理，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长期执政下去，避免苏联共产党亡党亡国的悲剧，就必须与时俱进地回答如何不断增强阶级基础，扩大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这一重大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新的社会阶层确定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把知识分子视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主张要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特别是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两个先锋队”的新判断，“面对我们肩负的历史重任，面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各种风险的考验，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① 极为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既要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又要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团结和凝聚全民族力量的决心。“两个先锋队”的提出，不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实际，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而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执政党如何提高和建设自己的执政能力，如何改革和完善自身的执政方式问题。执政能力是指党在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及社会事务中的本领。江泽民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考验和新要求，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认为党的各方面建设最终都应该体现到党的执政能力上来。强调党要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又一个突出的创新。从实践来看，一个政党能否长期执政，能否长期保持自己的先进性，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不能仅满足于自己所信仰的理论是正确的，也不能仅满足于自己的主观动机是要为人民服务。面对新的时代、新的任务，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个执政党的性质与其执政方式也不是完全等同的，在政党活动中，也可能一个政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由于不注意完善执政方式甚至采取的是不科学的执政方式，如高度集权、人治大于法治的执政方式，就反过来会影响党的先进性质的实现，以致弱化党的先进性和权威性。能够自觉地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创造性地回答这个问题，正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独到贡献。它改变了一种传统的观念，即只要党在理论和思想上确定了自己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她就自然是先进的政党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并认为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强调党要学会依法执政，从仅依靠政策执政，转到既依靠政策又依靠法律执政，从以党代政转到以党总揽全局，善于把党的执政权力通过法律形式上升为国家意志，更有效地巩固和提升党的执政地位和权威性，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同时，还强调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减少冲突，提高效率。江泽民认为，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要着力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执政人才。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江泽民始终把建设一支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忠诚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治军的政治家队伍当作重要的战略任务，认为这一条做好了，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为此，江泽民强调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并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还特别强调：“要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根本目的，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按照中央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一靠教育，二靠制度，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着力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特别是要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①。这些重要论述为进一步推动党的干部建设的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指明了方向和方法。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4、572—573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执政党如何深化认识执政规律问题。所谓执政规律，是指政党在控制和行使政治权力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反映政党政治本质和必然性的法则和客观要求。“三个代表”对此作出了系统的回答，指出党执政最根本的、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运用手中的权力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这是所有执政党都必须遵循的规律，共产党因其性质所决定，应当做得更好。江泽民认为，要搞好这一任务就不能脱离群众，离开了群众不但完不成这一任务，而且还会面临最大的执政危险，所以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因为，党的先进性在于她反映了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在于她反映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于她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共产党要长期执政必须遵循的根本规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提出要分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进一步在推动社会发展上具体化，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发展进程之中，从而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现实需要，拓展了邓小平的“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江泽民认为，2010年前，是第一步。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2010年到2020年，是第二步，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从2020年到2050年，是第三步，通过30年的奋斗，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走在中国社会发 展前列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始终是与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时候坚持并做到了“三个代表”，党就兴旺发达，就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经得起任何风浪的冲击。什么时候如果偏离或没有完全做到“三个代表”，就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民就会不满意，党就会遇到困难和曲折。“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赋予的、人民赋予的。党能够执政并且能够执好政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就在于能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执政的内容和任务，就是要不断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推进社会发展。就是要不断建设和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育“四有”公民，弘扬民族精神。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任务更加艰巨，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更多、更复杂。只有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三个代表”是中



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源。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只有几十个党员，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今天世界上的第一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曾经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内外敌人，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能够经得起各种风浪、磨难的考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答案是什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系统而准确、全面而科学地作出了唯物辩证的回答：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推动中国文化的进步，切切实实地为人民办实事、谋利益。这是党的全部力量的源泉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成就，不断发展壮大，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原因所在。

中共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3. 科学发展观：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开拓性总结

发展问题，是人类社会时刻都会面临的根本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在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发展新趋势和现实新挑战，发展问题愈发受到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见根本改观，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得到根本扭转，城乡、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这些矛盾的存在，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深刻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这些阶段性特征和反思总结国内外各种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利弊的基础上，针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问题，不断探索而创立的理论成果，这一成果一经形成，就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行动指南。

从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状况来看，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加快经济建设，一段时间内，在许多国家都相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奇迹，似乎世界已经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发展新格局。然而，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因片面追逐经济增长，各种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包括资源环境破坏过度而导致资源枯竭危机和各种污染问题加剧，经济结构失衡导致发展后劲不足，以及由于社会公平缺失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出现失业增加、贫富

悬殊、腐败丛生等等问题。1962年，美国学者雷切尔·卡逊发表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一书，该书通过大量触目惊心的事例分析了人类发展对资源环境的破坏，揭示了人类一方面在创造高度的文明，另一方面又在毁灭自己的文明。在该书中，卡逊认为环境问题如得不到解决，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1972年，主要聚焦于未来学和全球问题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的反响。该报告提出，由于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自然资源的过度耗费最终必然导致其枯竭。基于此，该报告做出了世界性灾难即将来临的预测，认为如果世界现有的人口状况、工业发展、环境污染、粮食生产、资源耗费的基本趋势不变，那么，人类就将在未来100年内的某个时间节点达到增长的极限以至崩溃，该报告还设计出了“零增长”的应对方案。在这样的思想观念逐步受到人们重视和认同的背景下，到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有识之士进一步提出了各种新的发展观。如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撰写了《新发展观》，强调传统的发展理论把增长只看作是由资本、价格、供需等自发调节的结果，忽略了教育、职业培训、人的素质提升等因素，造成经济与文化的对立，导致实用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盛行，该书提出了“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关心文化价值”的新发展理念。再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1980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将这一概念上升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广泛吸收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广泛借鉴国外新的发展理论的有益思想，并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进行了理论创新和创造性阐发。从国内的发展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采用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长期采用的依然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日积月累，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约束性愈发明显。同时我国的发展一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另一方面是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区域发展和行业发展不均衡。另外，因长期受以物为本的思想影响，收入分配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就业压力、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事业等民生问题成为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不但会对进一步推进发展产生严重影响，而且还会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兴国带来巨大挑战。国内外的经验说明：在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辩证关系，如果不重视质量和效益，单纯地扩大数量、追求速度，忽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忽视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经济建设是难以搞上去的，即使一时搞上去了，最终也将付出沉重的



代价。正是基于对国内外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的深刻分析和开拓性总结，胡锦涛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针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总结指出的：“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①

科学发展观的创立经历了一个在提炼实践经验基础上初步提出，到不断完善，再到成为全党共识、被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的过程，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特点。2003年，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和创立的关键一年。2003年4月，胡锦涛在广东视察“非典”疫情时，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概念。7月，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上，指出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②。这一年的8月至9月，在江西考察工作时，胡锦涛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强调要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03年10月14日，党的第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到2004年3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并对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了精辟分析，标志着科学发展观基本形成。科学发展观一经形成，就成为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指南，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全面阐释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具体而明确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③标志着科学发展观已经形成为系统而完整的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④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近来以来的中国历史充分证明了发展的重要性。中国本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东方大国，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近代以来，由于封建的中国思想观念落后，制度僵化，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②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

^③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④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策，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不能通过接受新鲜事物和新兴文明成果快速促进自身发展，屡屡错失发展良机，经济发展缓慢，被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西方诸国远远抛在后面。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更证明了落后就要挨打，振兴依靠发展的道理。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历史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初步形成了一些独创性的理论，但也出现了重大失误与曲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之初，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我国的社会主义建立于生产力发展较为落后的基础上，要取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关键就在于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好些、更快些。胡锦涛坚持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坚持用发展的方法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中遇到的问题。胡锦涛认为，离开了发展，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不了，而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也只能通过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对此，胡锦涛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① 这一论述就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的深刻诠释。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后，那么究竟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来实现发展呢？这分别涉及价值观和方法论两个层面，对此，科学发展观做出了既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又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的创新性回答。即，我们所要实现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回答了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这一根本问题。以什么为本，是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如果以物为本，必然就会导致将发展简单地理解为经济的增长、物质的丰富、生产力的提高，就容易把人看做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工具，为了经济总量的提升而不惜以牺牲人，尤其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和幸福为代价，不惜以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为条件，这样的发展也许在一定时期内会取得经济指标的高速增长，但是不仅会缺乏长久的动力，而且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价值追求。如果坚持以人为本，就必然会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成目的，把实现人的福祉当成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就必然会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为本源、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点不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而且也在价值立场上实现了

^①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50页。



对国外各种发展理念的超越。胡锦涛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①这一论述把能否坚持以人为本上升到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分标志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和把握，是极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决定力量，而人则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立场和基本判断，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都是需要牢牢把握的核心问题。以人为本所体现的是：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就要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保障人民权益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致性，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如胡锦涛所总结：“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②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实际上科学回答了怎样发展这一重要问题。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全面发展，与全面发展相对的是片面发展，片面发展就是只注重某方面的发展，而以其他方面的停滞甚至倒退为代价。比如，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只注重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忽视文化事业的进步。科学发展观认为这样的发展是必须加以改变的，特别是自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是对原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拓展和深化。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全面发展的认识更加深化。总体来看，科学发展观所强调和追求的全面发展，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推进“五位一体”

^①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69 页。

^②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50 页。

的总体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协调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因此，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抽象的，都必然会与其他事物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有机统一关系，要推进发展，就要协调好事物间的这种复杂关系。科学发展观坚持了这一科学原理，强调推进科学发展，就是要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特别是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使社会结构各个层次、各个要素相互支撑、互为促进，产生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大化的合力。科学发展观要求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实质上就是要求发展具有持久性、永续性的理念，而不搞竭泽而渔式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总要借助一定的自然资源，但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必须为下一代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留下空间和条件，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着眼点。因此，推进发展，需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积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从而实现发展的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正如胡锦涛所指出：“我们之所以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来强调，这是因为：一方面，经过长期发展，我们积累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技术条件，可以在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有更大作为；另一方面，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不适应等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只有更加自觉地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更好化解对我国发展的各种制约因素，更好推动我国发展进程，确保实现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①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统筹兼顾不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条宝贵经验。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提出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强调要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江泽民则指出，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胡锦涛总结这些科学思想并不断对新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提炼，全面发展了统筹兼顾的思想，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思想，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①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党的十七大报告在“五个统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拉大；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矛盾加剧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等。科学发展观就是在回应这些现实问题和重大考验的过程中逐步创立的，并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理论依据。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发展和完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性回答

中国共产党是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科学理论武装自己的伟大政党。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用理论创新成果指引新的具体实践，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秘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就是必须在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在回答这一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回答和解决的问题相衔接，又有基于新时代的全面拓展。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行理论创造，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创造都回答和解决了当时最重

要、最紧迫的时代课题。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需要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探索。正是围绕这一重大问题，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历史方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共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

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②近代以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大历史任务。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第一个任务，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中国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由邓小平开辟，江泽民、胡锦涛继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进了经济的现代化，逐步实现了国富民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③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在站起来的基础上，在富起来的康庄大道上继续前进，越来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自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实践与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是由于新的伟大实践需要新的伟大理论指引。从国内来看，

^① 《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6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



经过改革开放的努力奋斗，我国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国经济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多项发展指标跻身世界前列，中国蕴涵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但是，改革逐渐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有许多难啃的硬骨头需要应对。从国际上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向纵深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格局深刻变化。随着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全球性问题相互交织，新旧矛盾相互叠加，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世界格局正处在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时代潮流。在国际经济大调整的关键时期，各个国家之间既需要共同携手应对和解决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同时又面临着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更为激烈的全方位竞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经验，深入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着眼于新时代新问题的解决，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实践与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基础上，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视野，明确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内容。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创新，也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新水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包括“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的完整体系，其中蕴含的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新阐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辟了管党治党新境界，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提供了基本遵循，为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从理论层面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核心的内容是“八个明确”：

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八个明确”是实现中国梦的“航标灯”和“价值论”，主要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八个明确”内容清晰、紧密联系，构成为相互独立又彼此衔接的有机整体。其中，有发挥牵引作用的奋斗目标，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具有统筹意义的发展战略，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影响全局的重要工作领域，如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强军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有至为关键的政治保证，即处于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地位的党的领导和突出政治建设重要地位的党的建设。这样一些基本内容，涉及当前要求与未来目标，涉及整体布局与重点领域，涉及国内改革与国际关系，涉及事业发展与领导核心，构架起并展示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完备形态和整体面貌。

从实践层面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包括“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十四个坚持”是实现中国梦的“路线图”和“方法论”，主要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干”的问题。从内容来看，这“十四个坚持”涵盖坚持党的领导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涵盖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对外战略，是对党的治国理政重大方针、原则的最新概括，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战略与战术相结合，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路线图”和“方法论”。这“十四个坚持”，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要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绘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蓝图。

高度重视国家发展战略的谋划和实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指出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更清晰、更明确、更具体，也更加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新时代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

“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是党在新时代建设的目标；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是具体的八大建党方略。其中，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不变原则；强调“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是为了“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顺应时代发展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征程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必将取得新的胜利。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2、20、24、26、62、17页。